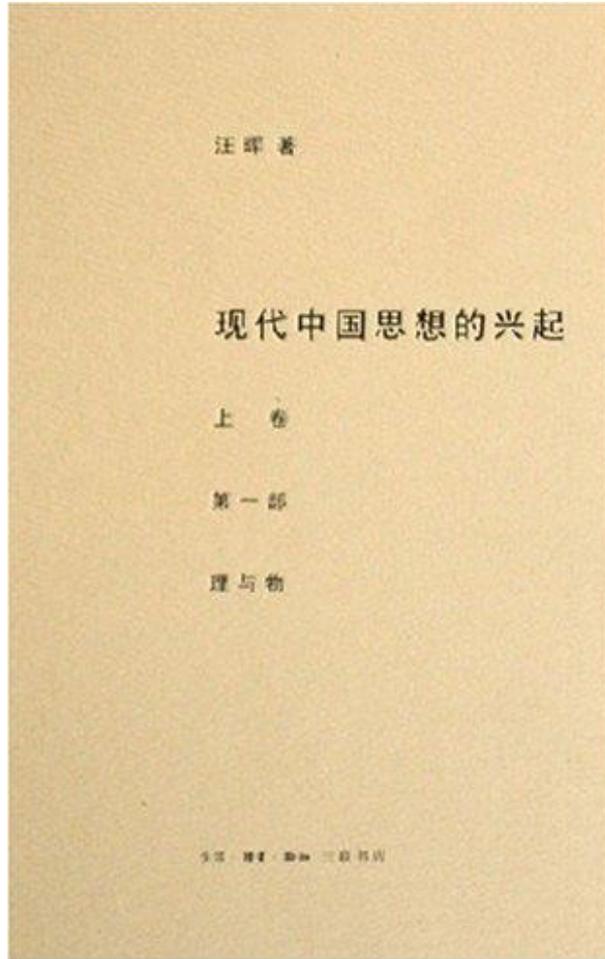


汪暉談生態問題

日前，汪暉教授在接受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劉健芝教授的訪談時，談到了他對生態問題的關注。以下為訪談實錄。



劉：汪暉，我還想問一下關於生態的問題，為什麼你會那麼關注水壩的問題。

汪：這實際上有一個從書本到實踐的過程，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我自己做這個思想史研究的時候，其中一個課題是對科學主義的討論，近代科學和科學主義的討論。我在《現代中國思想興起》的第四卷幾乎整個一卷都是討論這個問題，而且開始得是比較早的，90年前後就已經開始這個討論了。那這個討論一定程度上有它一定的歷史脈絡，這個我覺得是歷史跟理論的脈絡，在思考這個問題。對於科學主義的討論很自然的一個部分是關於思想、世界觀、價值觀，一個是關於現實，就是我們現代社會的基本構造是按照這個結構來的。所以也就等同於開始了一個對發展主義的基本思考，對於現代化過程的思考。因為我們從80年代以來，現代化就是一個最主導的意識形態，當然我們可以說100年來都是如此。我大概在90年代的思考當中一個很主要的思想脈絡是，重新反思現代化的意識形態。所以從理論上說這也就不可避免地追溯到這個過程。這是一個，

第二個對於資本主義的再思考、資本主義的研究來說，我的確認為現代生態危機是跟資本主義發展連在一起的，因此這兩個方面是相互關聯的。所以我自己 90 年代做這個關於科學問題的討論的時候、科學主義的討論的時候，實際上是包含這個脈絡，因為對於自然的控制，也是對社會的控制的一個方式，這個（是）過去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一個命題。我也是相信在這個意義上，因為我們對自然的爭奪同時等於社會和政治的結構都是跟著它發生關聯的，人和自然的關係反過來是人和社會的關係，這一點是很早就開始思考的。



費孝通先生

以後捲入到這個生態問題的運動裡面，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我在 96 年開始編《讀書》雜誌，編《讀書》雜誌以後，我對這個所謂現代化的再思考、發展主義的批評實際上在《讀書》裡面已經在組織這些討論。當時我們也組織過幾次專門的關於科學主義、發展主義的圓桌討論，在《讀書》上發表過關於科學主義、人文地理、科學和科學史問題，也包括鄉村發展，都涉及發展模式問題，其中也包括生態問題。那個時候中國知識界對這個問題不能說沒有關注，但是不夠重視，我印象中反而是老一代的有那麼一些學者對一些具體問題有思考，我印象比較深的比如說費孝通，他對太湖流域的調查，對太湖的污染情況的分析，另外他強調太湖周圍人口密集，人的污染高於其他的這些污染。這個《讀書》後來都發表，也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所以後來藍藻爆發各個內湖全部污染。再就是我們曾經

發表過一組黃萬里的文章。黃萬里是當時對這個黃河三門峽提出異議的一個科學家，那以後在這個長江三峽問題上，他又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我們那個時候在他的晚年，他留下了一些稿子，所以我們就發表了他的這些遺稿，不是遺稿，當時還在世，他的最後一篇文章是他去世後才發表出來，是他的遺稿。我們也還有一篇是直接討論長江三峽的文章，是他的遺稿，沒有能夠發表，因為太現實，比較尖銳，沒有發表。我自己在《讀書》的編輯手記裡面也專門寫過關於黃萬里和這一類跟生態有關的文字。我們那個大概在 90 年代，就是我編《讀書》期間也曾經參與過到長江的考察，我們跟一群研究長江問題的人。他們主動來找，因為《讀書》發表了這些文章，他們就主動來找我們。所以我跟著他們一起去長江沿岸，去看過，然後也專門參加了他們的討論會，一些水利的這些。基本上有兩種理論，一種是進一步現代化，為了解決水資源，但同時也發展出怎麼樣保護生態，這是第二種理論。



已故人類學者 蕭亮中

另外一個因素可能是 96、97 年我在香港的時候，就跟你、寶強，我們一起，我們那個《發展的幻象》那本書其實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的，是吧？對於發展主義的分析我覺得當時寶強和你的思考已經是比較深入的，已經比較全面的，所以那時候參與大家一塊兒討論，以後我從香港回來我們一起編這個書，我記得編這個書的過程中那個《大壩經濟學》不是放在我們這一套，也是我拿到後來給了另外一個出版社，最後出版了。金沙江那個問題的時候，蕭亮中買了好多《大壩經濟學》

分送給這些人。這是之前的脈絡。之後的脈絡就是我自己和我們當時《讀書》的關注當中除了生態問題，還有一個是關於文化多樣性的問題，就是對各個民族地區的生態進行觀察。黃平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為他是社會學家，他要跑很多地方。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做了一個叫做《田野雜記》去研究各個地方地域的文化，因為我們逐漸形成了一個基本看法是：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是密切相關的，所以這個也跟我以後研究討論區域這個問題有關係。因為區域是一個生態、人文都綜合在一起的一個概念，同時也可以區分開來的一個概念。那麼大概是在2002、2003年前後，我有點兒忘了，蕭亮中來找我，當時他也發表了一些，在《讀書》上發表文章，他來找我，他說我們談過關於西藏問題的一些討論。那麼那一年在雲南，有一個關於藏族文化和生態多樣性的一個學術會議，所以他們邀請我去，我也說我不是藏學方面的專家，也不是生態方面的專家，但是我有興趣，所以他們要我去我也就跟著去了。去的過程中除了參加這些會議，因為那個會議很有意思，除了一部分跟西藏文化有關的，有一批在雲南活躍的 NGO，實際上都是以環境問題為中心的，他們都在，後面分組的一些討論他們都參加了。當時我就注意到這樣的一些狀況，因為像大自然協會他們也是在地化的，他們的這些幹部實際上是當地各民族的成員，所以聽到他們的一些討論。以後我又有機會跟這些藏學家還有活佛一起去德清，然後去梅裡雪山，所以一路跟這些，主要以藏族為主的少數民族的一些人座談，討論當地的生態、文化、土地政策等等。



虎跳峽

最後，我記得是在那次會議過程中我第一次聽說有這個虎跳峽建水壩的計畫。當時就跟蕭亮中他們談過，問過這個問題，當時我記得走到賁子蘭，他們說這個地方可能以後都要淹掉。（我）覺得非常可惜，因為這個對生態多樣性、文化多樣性都有影響，再說虎跳峽是一個著名的大景區。我回到北京以後，蕭亮中當時就跟我商量能不能做些事兒，我說我不是特別瞭解這情況，所以我就跟亮中說，我說你要不先做點調查，你先期的，我後來。他是當地人，所以他留在當地去調查各方面的情況，我也介紹他一些人，當地政府的一些人，讓他去跟那些人接觸，看看到底什麼狀況，因為你要說話總要做點調查。我在北京，他經常打電話說這個狀況是怎樣怎樣，就希望我能做一點事，而且希望能產生影響的，要不然整個虎跳峽就破壞了。那我說既然要說話，我又不是這個領域的，我還是覺得很為難，然後我當時還是不管怎麼說決定我自己去做一遍考察。這樣我就又找了一個機會自己去，當時我記得是夏季，所以（因為）雨水那個地方比較危險，虎跳峽那個山上掉石頭非常危險，而且公路也斷。我自己步行穿越哈巴雪山，我一直走進去，沿著這個虎跳峽，上虎跳，中虎跳，下虎跳，沿著這個走了一遍。走了一遍以後當然也再做一點其他的文字的調查，這樣的話就對這個情況有了一些比較第一手的接觸和瞭解，也跟當地一些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作了討論。這個之後我們就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會議，其實參加會議的當時大部分是環境的 NGO。這些 NGO 當時做了一些地方性的東西，但是始終沒有這麼大影響的一個、能夠把大家團結起來的這麼一個活動。而且這個活動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第一次，主要是由於蕭亮中的原因，他因為是當地人，又涉及到金沙江峽谷地區的這些民族的生存狀況，所以他在北京跟金沙江之間穿梭往來，其中使得當地的農民，因為它做這個要牽涉到大量的移民，它因為牽扯到這些狀況，這個當地的村民開始主動地參與這個事情，所以這件事情對當時的環保運動來講，也是一個重要事件。原因是第一次真正的由村民們自己組織起來對自己的生存狀態要發言，那麼同時又跟其他的一些從事環保運動的人，還有一些我們這些並非職業的從事環保運動的人。我們當時做過一個公開信，海內外都有一批人參加，所以這個公開信的發表，和當時媒體的報導，國內、海內外媒體的報導使得這個金沙江問題成為很重要的問題。那個時候國家相對的說它在這方面容忍度也比較寬，我記得有一年國務院發改委搞一個電力改革的國際會議，好像是哪個國際組織跟國務院發改委聯合搞的。我們當時把這個金沙江河谷地帶一個村民的代表請到北京來，他在這個國際會議上發表了講話，而且當時的報紙，像《中國青年報》，都是頭版，一個村民的大頭像在那個國際會議上發言。最後，金沙江水壩的建設尤其是虎跳峽項目變更了，它的位址改掉了。金沙江還是需要水壩，它是在上下虎跳還是有，但我們的努力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長江三峽水電站

因為我們現在的生態問題基本上以碳排放為中心的，但我們中國的碳的依賴量高，過去高到 70%、80%，現在比較低了，大概 50%多一點，起碼一半以上，仍然是要大規模依靠碳。那我們現在的技術，使用碳的清潔技術目前在全世界都是領先的，這都是事實。但是也碰到一個問題，因為我們要（降低）碳排放以後，所以大家覺得水力是唯一的清潔能源，當時還有一些人提出核能源還是可以用的。可是因為這個福島危機之後，大家也知道它也是哪一天要爆發了就不得了。所以一方面是核能的不可靠，就是它總說是安全的，誰也不敢預估，第二個是你有一個碳排放的標準，這樣水的壓力、水電的壓力、水利的壓力就變得很大，這對中國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般來說把水電當成清潔能源，可是水電碰到的問題一個是破壞江河的生態，第二個是涉及大量的移民問題。長江三峽當年是這樣，現在的這個怒江啊其實都涉及到移民和移民安置。那同時這些地區又因為它是多民族地區，所以它當然也會涉及生產方式和文化多樣性的問題，所以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再加上這些地區的河流有多半是國際河流，就是它不是一個國家的，它還牽扯到國際間的關係，所以這個過程裡面有非常複雜的，客觀上講生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不僅僅是現代化、發展主義這些問題，還牽扯到更加複雜的政治問題，這也是以後我們做過的一些工作。

最近剛剛結束巴黎氣候談判。5 年前在天津也有一次氣候談判。當時有一批人，長期從事這個工作和研究的人提供了這些最基本的資料。我跟鄭義生我們一起牽頭找了一批人，給當時的中方談判代表薛正華，也是這一次的主談判代表，和美國方面的談判代表各自寫了一個公開信，這個公開信在國內國外都發表了。最近我看他們又有人把這個 5 年前的信翻出來，因為基本的問題沒改變，其實談來談去基本問題沒改變，而且現在說是達成了共識，但實際上美國在這方面的責任也

完全沒有盡到。中國方面不能說不重視，相比較中美兩國的話，中國方面的重視和推進從政府的努力來說、從社會的關注度來說，跟過去相比，那還是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也是實事求是，是有大量資料的。可是我們也看到，作了這麼多的努力，國際談判當中作了這麼多的妥協和讓步，但是我們的生態還是在持續地惡化，霧霾持續嚴重，也就是說這個是遠遠不夠的。



北京霧霾問題嚴重

這個不夠不是意識的問題，是發展模式的問題。你只要在這個模式下，你只是用修補的方法就是很難解決這個問題。美國跟歐洲發達國家推卸它們的歷史責任，它們在當代承擔的責任也不夠。由於它們在這個談判當中它們對媒體和 NGO，它們處在比較有利的地位。尤其是最近五、六年來，對於發展中國家，中國（和）印度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能夠真正地推進生態的改革，全球性的，包括我們國內的改革，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生態的問題。

所以關注生態不僅僅只是一個生態問題，我們通常說的環境問題。那我補充一點的就是當時，我忘了是在哪年，九幾年，《天涯》雜誌發表了《我們為什麼要討論生態》，當時黃平，李陀，少功他們組織了那個會，我不在，我沒有參加那個會。這說明當時對環保問題的關注是中國知識界集體的圍繞環境問題發出聲音。另外，我們在《讀書》組織有關生態的討論，有一些老先生，他們就說你們這些討論都走得太快了，這些問題都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不是中國的問題，所以意思是說中國現在主要的問題是一個發展的問題。我們並不是說發展的問題不重要，可是發展模式的問題是一個核心問題。這是當時為什麼捲入生態問題的一個因素，還有很多。

（訪談錄音由陶然整理）